

责编/乐建中
审读/邱立波 美编/徐哨

三年师范

□杨东标

因为家境艰难,初中毕业后,我报考了师范学校。

那是1959年夏秋之交,宁海与象山两个县合并成象山县,“大办教育”促成了“象山师范”的诞生。两年后又分县了,位于宁海县城的师范学校,又改名为“宁海师范”。

仿佛命中注定似的,选址在东门的师范学校刚开始动工建造,没有校舍,我们又集结在跃龙山。不同的是,初中读书在山上,师范的过渡性校舍在山下。跃龙山,小城的灵秀之地,你给我们年轻的学子多少丰厚的馈赠啊。

当然没有一点学校的形貌和规模,一排简陋的平房,两间教室,一间教师办公室,就是学校的全部。依然是不断地劳动,依然是年龄大的男同学挑起干活的重担,例如去双峰山放筏木料等等,还清晰地烙印在我们的记忆里。

第二年,我们搬进了崭新的校舍。这时候,又招了四个班级的新生,还有一个速师班,只读一年的。我们读的是三年,属普通的中专师范,所以叫普师。学校顿时像模像样起来,让年轻的我们很自豪很满足。那条我们自己动手铺就的嵌着59(2)班字样的石子路,现在还在吗?

都说师范是出人才的地方——后来我与宁波文友陈承豹、林邦德(他们也都是师范学校毕业的)一起聚会时,常常会听到这个话题的议论。是的,我们国家的最高伟人不是湖南一师毕业的吗?至于浙江的第一师范学校,20世纪二十年代时真可谓群星灿烂。从教或从学于此的有经亨颐、陈望道、夏丏尊、朱自清、李叔同、刘大白、叶圣陶等一大批大文豪,从我们宁海家乡走出来的潘天寿、柔石也是在这个学校毕业的。我们自然是不能与之比肩的,在他们的面前我们显得很渺小,我们这样的议论,大概是给自己以鼓励,以自勉,以楷模吧。

但是,有一点我是清楚的,我长大了,我称得上是一个年轻人了,小时候的顽劣、不懂世事将成为过去,一切要在此时此地有所长进了。我不久就入了团。由于我的学习成绩优秀,我成了班级里的学习委员(我还记得另一班的学习委员是邵常娥,非常优秀,后来成了书法家,她是诗人潘志光的夫人)。

我对文学的热爱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。语文老师陈淼川写得一手好字,他的板书让我们得到艺术的欣赏;他的讲课,深入浅出,亦庄亦谐,像春雨润物一般动听。我的作文总是被他在上课时朗读。最让我自豪幸福的是学校里的那块宽大的黑板报,成了我常常发表作品的园地。记得那一年县里围海筑堤建造毛屿港,大坝合龙时,集聚了县里许多部门的人力,农民、职工、机关

干部、学生,长堤上推车的推车,挑担的挑担,临时扯起的大灯泡,分贝震耳的大喇叭,人们通宵达旦,挑灯夜战,决胜大潮的时刻即将到来。我年轻,半夜两三点钟,挑着装满石头的担子,摇摇晃晃,路边倒下一歇,就睡着了,随即又被激奋人心的喇叭声、口号声、鼓声惊醒,又继续挑担飞奔起来……回校以后,我写了一组诗歌,大约有四五首吧,被工整地抄写(或者叫发表)在那块宽大的黑板上,几乎占了全版。那一刻,同学们给我投来赞许的目光,我是多么地开心啊。

我常常钻在学校的图书室里阅读报刊。最让我记忆难忘的是,有一次在《光明日报》上读到了郭沫若写的“关于《再生缘》校订”的一篇长文,整整一个版面。文章里的孟丽君、皇甫少华的动人曲折的爱情故事,让我读得心动而神往,透不过气来。后来的越剧《孟丽君》就是根据《再生缘》改编的,成为越剧的经典剧目。这是我读小学和初中时,读完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的另外一种感受。而《红楼梦》则是在工作后读的。从此以后,我许心文学的种子算是真正地扎根在心田里了。

我也热爱艺术。学校里有一位教导主任叫刘式桓,听说是毕业于南京艺大。他善音乐,又能画画,多才多艺,给我影响很大。他教美术,常常到街头墙上画巨幅的关于大跃进题材的宣传画,如稻谷丰收、养猪千斤之类的,我也跟在旁边涂抹。他会作曲,发表在《解放军文艺》上红极一时的歌剧《红珊瑚》,他亲自作曲,尤其是珊妹的那段核心唱词:“十九年,随爹爹,乘风破浪,渔家女,从来是,照海梳妆……”被他谱得缠绵悱恻,优美动听。他筹备成立了学校歌剧院,让“普二”的一位亮丽的女生演主角珊妹,让读“普三”的我演男主角王永刚。遗憾的是,许多唱段都学会了,而最后戏没有排成,半途夭折,而戏剧的魅力却影响了我一辈子。这是否是一种宿命呢?后来,我被调往剧团,从事舞台美术和编剧工作,是不是与三年师范生涯有关呢?

那时候,每个班级都有一台风琴,是一种外形类似钢琴,通过脚下踏板送风,双手弹奏键盘的乐器,现在已经很少见了。虽然不及钢琴高贵,演奏的原理却是近似的。我自然也乐此不疲,常年课余操练,以至学校里每周要举办一次以班级为主的歌咏演唱会,我班的大合唱,老师指定风琴由我弹奏。我还参加学校合唱队,排练了《黄河大合唱》,我虽然没有资格演唱男高音独唱《黄河颂》,而张老三那段对唱却落在我这个五音不全的人的身上。至今回忆起来,那次在学校文艺晚会上表演的《黄河大合唱》,还余音绕梁,激荡人心。我也曾尝试学习作曲,其实是不伦不类一窍不通的,拿去

给时任音乐教师的顾茂恩看,被他大大地鼓励了一番。后来想想,我有点浅薄得不知自己是谁了。

我的师范生涯啊,是我青春萌发的最纯洁最美好时期。我的心灵受到知识的滋养,艺术的熏陶。那时候,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,我们的生活是很艰苦的,一日三餐每个学生要拿一个泥陶罐子,里面装着二两米,掺着番薯干之类的杂粮,放在食堂大锅里蒸,菜蔬极为寒酸,肚子自然是吃不饱的,怎么日子还过得这么生动活泼、丰富多彩的呢?

有一件事,是必须写几句的,让年轻的我永记不忘。有一天,学校通知,全体学生去宁海中学参加一个大会。什么大会呢?不知道。一进宁中大礼堂,黑压压的宁中学生挤满了会场,一种庄严肃穆的氛围让我们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。县公安局的同志与学校的领导坐在台上,然后宣布,在宁海中学高中部学生中破获了一个坏分子团伙,好像是以爱好文学的名义成立的一个什么党,当场逮捕了两个主要头目。一位参与者痛哭流涕地交代并忏悔了自己的错误,他是我当年初中的同学。我感到触目惊心,不寒而栗。我胡思乱想,如果当年我也报考读高中,我也爱好文学,我会不会堕入其中?一个人的命运真是不可测的。也许一步之差会坠入地狱。我庆幸自己读了师范。很多年后听说,该事件是个错案,撤销原判为无罪。即便如此,一个人的一生就这样被毁了,真让我感慨万端。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接受到的残酷无情、醍醐灌顶般的政治教育。

当然,我们师范里的情景显然要清纯得多了,好像是一片阳光和春色。尤其是师生关系。三任校长张良圭、陈从长、孙榛贞以及两位班主任好像对我都特别好,他们个性各异,经历不一,培土育苗的心却一般地炽热。特别是张良圭老师,热情爽朗,心直口快,颇有长者之风,他总是勉励我不断奋进,多年以后,总是

在人前人后说:杨东标是我的学生。令我感动。他以我为学生而自豪,我也以他们为我之师而光荣。学生都是老师教出来的,学生稍有一点长进,最高兴的总是老师。没有师范这所学校和教我育我的老师们,怎么会有后来的我呢?

三年的师范生涯一转眼就要结束了。我们读了《心理学》、《教育学》一类只有师范学校才有的功课,又到几所学校里去实习了两个月,初尝了当教师的滋味,回校以后,我们就要毕业了。年纪稍大的同学都开始悄悄地谈情说爱。我们这批年纪较轻(我才19岁)的同学好友,则常常坐在篮球场里话别。记得那个月夜,浓浓的离情别绪弥漫在夜色里,月光分外清朗,星斗正在远行,我们一起唱那首《毕业歌》——电影《桃李劫》的主题歌:“同学们,大家起来,担负起天下的兴亡……我们今天桃李芬芳,明天是社会的栋梁……”唱得热血沸腾,激情飞扬,一起祝福我们的明天。明天是什么呢,谁也不知道,只知道国家是困难时期,教育在调整,在缩编。第二年,师范就停办了,后来改为县办丝厂了。部分“普二”的同学则转学到宁海中学去读高中。按理说,师范毕业都要分配去当教师的,或城镇,或农村,但是,听传说,有一部分人连当代课教师都有困难。不能不令人担忧。

所以,那个月夜,那个弥漫着离情别绪的月夜,带给我们的除了向往和期盼,还有不测的迷茫和惆怅……

后来,同学们都各自有了不同的工作岗位,我也转到文艺界,我慢慢悟出了一点道理,师范学校之所以会涌现一批人才,是因为与高中的教学宗旨不一样。高中追求成绩,为高考而冲刺;而师范,则提倡为人师表,德智体全面发展,因此,体音美之类的功课则显得特别重要。这很切合我的爱好,现在回忆起来,我毫无遗憾,觉得是命运赐予我的合理安排。

